

海洋命运共同体国际传播的话语建构

唐润华¹, 罗韵娟², 邱怡²

(1. 大连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辽宁大连 116000;

2. 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东广州 510000)

摘要: 话语建构是国际传播取得理想效果的前提: 首先通过确立核心话语来阐释传播内容的内涵和特征, 其次通过对话语框架的选择运用来揭示传播内容的正当性和可信性。“海洋命运共同体”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海洋领域的延伸与发展, 其国际传播必须将话语建构作为重要部分予以高度重视并精心设计, 将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意义、价值基础、目标愿景和建设原则作为其核心话语,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公共产品和全球海洋治理作为其话语框架, 通过客观真实、全面准确的阐述, 让各国公众对海洋命运共同体有更多的认知与认同。

关键词: 海洋命运共同体; 国际传播; 话语建构; 核心话语; 话语框架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8418 (2024) 03-0033-08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人民海军成立70周年时首提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1], 指出“我们人类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 不是被海洋分割成了各个孤岛, 而是被海洋连结成了命运共同体, 各国人民安危与共。”^[2]当今世界海洋领域面临环境污染、资源过度开发、海上安全受到威胁、国家间地缘政治竞争激烈、治理规则和制度体系亟待革新等诸多问题。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旨在回答“人类如何与海洋相处”“人类在海洋领域如何合作”等问题, 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海洋领域的具体实践, 是中国在全球治理特别是全球海洋治理领域贡献的中国智慧和方案。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要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全球现实, 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 包括让国际社会从了解、理解到认同和行动等重要环节, 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国际传播发挥作用。在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传播中, 话语建构不仅是信息传达的工具, 更是塑造认知、构建认同、促进理解与合作的关键桥梁^[3]。一方面, 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有其独特的国际政治和社会发展背景, 更有其独特的现实内涵和长远影响, 需要有与这种独特性相适应的话语表达; 另一方面, 海洋命运共同体作为一个“中国方案”, 在其推广和实施过程中必然面临中国与其他国家、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问题, 这需要合适的国际传播话语框架指导话语表达, 搭建起“共通的意义空间”, 这是增进国际社会对海洋命运共同体的认知与认同的前提^[4]。

一、理论基础: 话语建构

(一) 话语的界定与建构意义

“话语”指的是对主题或者目标的谈论方式, 包括口语、文字及其他的表述方式。^[5]索绪尔首先提出语言并不仅仅建立在外物基础之上, 其产生与构成有其自身内部的规则, 由语言内部符号的差异产生。^[6]这一观点肯定了语言本身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语言符号不仅是主观世界的客观反映, 也具

有本体意义,语言符号自身也构成世界本身。“话语”可以界定为由语言、观念、价值、知识通过一定的逻辑关系组成的陈述体系,是“话语权”的内容载体和语言学意义上的外在表现^[7]。由此出发,话语不单单是语言符号的表述,还是一种社会语言结构,具有建构性的特征,开始成为结构主义理论中的核心词汇。之后有关话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话语与权力、话语与意识形态、话语与身份构建等领域。福柯在1970年提出了著名的“话语即权力”的论断,认为话语的本质内涵大于客观所指,对话语的考察必须探索其背后的权力与意识形态。^[8]同时,话语具有形塑主体性的能力,能够在特定情境下发挥物质所不具备的权力功能。^[9]话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规约性,在人际交流和国际交流当中,只有达成了某种相互承认的共识或表述才有可能进行交流,而相互承认的形成就是话语规则的出现。这种规则与话语权息息相关,规则制定者即话语方可根据自身的意志建构世界。从国际战略、国际关系角度出发,这种规则制定与国际地位息息相关,无论是从传播效果,还是从国家利益来看,这种规则即话语权的争夺已经蔓延到了国际社会的各个领域。

费尔克拉夫指出,话语在社会意义上是建构性的。话语有助于社会结构的所有方面,这些方面直接或间接地构成或限制话语的建构:话语不仅是表现世界的实践,而且是在意义方面说明世界、组成世界、建构世界。^{[5] (60)} 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话语不仅是交流的工具,还是权力、身份和意识形态的载体。通过话语的建构,人们可以传达出特定的价值观念、信仰和立场,从而在社会中塑造出一种共识和认同。话语建构对于合法性的建立具有深远影响,一种秩序能否建立并保持稳定,取决于其合法性,即其赖以建立的价值和原则能否被其他参与者认同,以及在制度安排上能否和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各成员的利益。^[10] 国际政治在冷战后已经成为“话语权政治”,一旦某种话语获得主导性的权力地位,它就能通过话语的压制和建构功能为其价值取向披上“合法外衣”。^[11]

在国际交往中,话语作为意识形态功能具有塑造权力、强化权力、巩固权力的内生力量,强势话语生成话语权,^[12] 能有效传达国家在国际关系实践中的价值观念,赢得国际认同与支持,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话语权也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一个国家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并非同步发展,时常存在错位。我国硬实力虽在稳步上升,但软实力却较为滞后^[13],对外传播话语中的概念、范畴和表述缺乏充分有效的融通和对接^[14]。从实践角度来看话语权事实上关涉权力、理念、传播、文化四大维度,它是软权力的重要表现形式,是意识形态的语义载体,是塑造国际舆论的工具,还是文化影响力的外化形态。^[15] 话语建构在国际传播中不仅是信息传播的基础,也是国家形象塑造、舆论引导、知识传播和认同强化等方面的重要手段。在全球化背景下,加强国际传播中的话语建构对于提升国家竞争力、促进全球合作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 话语建构的逻辑与机制

一般认为,话语建构是话语主体等通过语言和其他符号资源在特定的话语实践中生产、再生产和解释话语的过程。梵·迪克将话语建构定义为在特定社会和文化语境中,通过语言使用来构建和传达意义、情感和态度的过程。^[16] 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使用语言和其他符号系统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和意图,同时借助社会文化情境和认知基础来理解和解释这些表达,其目的是让社会公众对某个事物本身以及话语主体对这个事物的态度有全面准确的了解和认识,同时又能对这个事物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产生共情乃至认同。

正如费尔克拉夫所言,不同的话语建构的是不同的世界,语言使用者通过在语言系统中的选择而实践话语建构,不同的语言形式选择能产生不同的建构效应。^[17] 从生成机制来看,话语建构大致包括两个环节:首先是确定核心话语,建立关于这个事物的基本内容表征体系,即知识体系;其次是确定

合适的话语框架, 建立关于这个事物的思想表征体系, 即价值体系。

核心话语是整个话语的中心思想和主导观念, 是对某个事物基本内容和特征的概括和凝练。确立核心话语对于话语建构至关重要, 不仅能够引导和组织话语内容, 突出重点和关键信息, 还能够增强话语的说服力和影响力, 构建独特的话语体系和风格。因此, 核心话语的确立既取决于事物本身所具备的内容的丰富性、深刻性和普适性, 也取决于话语主体对这种丰富性、深刻性和普适性的认识、总结、提炼与表达。话语主体要善于发现和抓住事物的基本内涵、主要特征和引人之处, 并准确清晰、通俗易懂地表达, 以唤起公众对事物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满足公众对事物全面认知的信息需求。而具备这些特征的核心话语一旦确定, 就可为话语建构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话语框架是话语主体用来组织和表达话语的特定结构或模式, 可以理解作为一种通用的话语编码与解码机制。“话语框架”是理解和解释话语的透镜, 它影响听者对信息的接收和处理。^[18]“框架”通常可以追溯到心理学和社会学的根源^[19], 指的是人们用来认识和阐释外在客观世界的既定认知结构。人们依据一定的框架解释与阐述现实生活, 因而框架又会反过来影响其对信息的感知和理解。在国际传播中, 话语框架的运用直接影响受众对特定事件、政策或观点的理解和解读。合适的话语框架能够为话语提供基本的逻辑和表达形式, 有利于话语主体引导信息组织、传达情感态度、构建社会身份等。而话语框架是否合适, 至少需要考虑如下因素: 是否与事物本身的特性以及相关受众的特性相适应, 是否与该事物涉及的社会语境以及话语主体的传播意图相适应, 是否有利于提升话语的可信性、说服力和感染力, 是否有利于提升话语传播的效果和效率。在话语实践中, 人们通常选择那些已经获得广泛认同或者受到普遍关注的话语框架来对某个事物进行阐释和解读, 以吸引受众兴趣, 并引起共情实现认同。

此外, 话语建构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无论是核心话语还是话语框架都有可能需要在实践中加以调整, 包括对话语内容的补充、解释和澄清以及对表达方式的调整和改进等, 以实现话语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二、海洋命运共同体国际传播的核心话语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以来, 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不少国家和地区予以高度重视和积极评价, 但也有一些国家和地区仍在观望犹豫, 甚至怀疑攻击。一方面是因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打破了全球海洋治理的传统格局, 是对既有海洋治理模式的一大创新; 另一方面是因为这是一个“中国方案”, 而国际社会对中国提出这一方案的动机有不同的理解。因此, 海洋命运共同体国际传播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对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进行全面介绍, 使各国政府和公众了解中国提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背景和初衷, 认识到海洋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和可行性, 从而消除各种信息迷雾, 建立正确认知, 达成共识。海洋命运共同体话语建构与国际传播间是共生互动关系^[20], 要建构话语体系首先需要基于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和特征, 基于国际社会及各国公众的共同关切和信息需求, 总结和提炼出一套核心话语, 包括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意义、价值基础、目标愿景和建设原则。

(一) 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意义

海洋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建构的第一步是回答为何要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国际传播受众是否能够接受中国方案, 首先取决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在跨文化语境中的意义建构是否成功。因此, 应该将“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意义”作为国际传播的核心话语之一, 通过对这一核心话语的阐释, 揭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必然性、重要性和迫切性。

第一,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符合自然规律和人类文明发展需要,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必要性。全球海域总面积 3.6 亿平方千米,约占地球表面积的 71%。全世界近 200 个国家和地区中,有 150 个国家的领土直接与海洋相连。全世界有超过 30 亿人依靠海洋及其资源为生,海洋经济产值高达 3 万亿美元。^[21] 海洋不仅在地理上将整个地球连成一体,且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

第二,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是改善全球海洋治理的必然选择。一方面,加强全球海洋治理的迫切性日益凸显。随着人类对海洋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过度开发、过度捕捞等问题日益严重,同时,世界各国之间关于海洋资源、海洋技术、领海主权等方面的利益冲突时有发生,海上安全面临严重威胁。另一方面,全球海洋治理面临困境。国际海洋秩序存在不公正、不合理现象,海洋治理规则制度供给不足,治理体系碎片化造成效能低下,个别国家为了自身利益而无视规则,建立全球海洋治理新机制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种背景下,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回应了国际社会的关切和呼声,为改善全球海洋治理提出了新思路、新机制和新路径。

(二) 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虽是一个“中国方案”,但它所依据的价值理念并非仅为中国独有,而是符合人类文明的根本特征、符合各国人民共同利益、受到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包括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文明交流互鉴理念等。国际传播需要将这些理念作为核心话语进行全面阐释,令各国公众对海洋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第一,全人类共同价值。2015 年 9 月 2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时讲话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22] 其中“和平与发展是我们的共同事业,公平正义是我们的共同理想,民主自由是我们的共同追求”。^[23] 这些理念也是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所必须遵循的价值基础。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海洋命运共同体旨在强调人类与海洋之间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强调了共同保护、治理和管理海洋生态系统的重要性。^[24]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后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同,已经写入多个联合国文件。这一理念倡导的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利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等也是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第三,文明交流互鉴理念。文明交流互鉴理念强调要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25] 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26]。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也要坚持文明交流互鉴理念,加强平等协商和对话,增进相互尊重和理解,减少矛盾和冲突。

(三) 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愿景

海洋命运共同体如何构建并达到一个怎样的目标,是一系列具体实践的指导。具体来说,海洋命运共同体国际传播可以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等维度来阐释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终极目标——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27]。

第一,平等互信是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政治追求。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倡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增进互信,增强海洋法治意识,促进国际海洋秩序的公平正义,坚决反对海上霸权主义。第二,和平安宁是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安全追求。面对日益严重的海上安全威胁和海洋安全治理困境,各国在从事海洋活动时应自觉维护以《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善意、全面地执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规则,坚持平等协商,加强对话合作,始终致力于通过和平方式推动有关海洋争端和矛盾得到妥善解决,同时加强合作,共同打击各类海上犯罪行为,共同维护全球海洋的和平与安宁^[28]。第三,互利共赢是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经济追求。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倡各国以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为指导,共建蓝色伙伴关系,促进海上互联互通,实

现全球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共同繁荣。第四, 交流互鉴是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文化追求。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倡各国建设开放包容的海洋文化, 推动各国加强海洋文化领域的合作与交流, 促进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融和互动, 增进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第五, 和谐共生是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生态追求。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直面全球海洋生态严重恶化的现实, 提倡各国走海洋绿色发展道路, 在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过程中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 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良性循环。

(四) 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原则

研究阐释海洋命运共同体如何建设的问题, 不仅有助于各国公众了解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是否可靠和可行, 还有助于国际社会判断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究竟谁会受益。海洋命运共同体“共商共建共享”的建设原则应该成为国际传播的核心话语, 从理论上加以全面阐释, 并用具体的实践加以证明。

“共商共建共享”是中国提出的一种积极、开放、包容的全球治理理念, 旨在推动各国共同参与全球治理, 实现合作共赢。在全球海洋治理中, “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同样适用, 可以为解决海洋问题、实现海洋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思路和方法。第一, “共商”就是平等协商、共同决策。“世界上的事情越来越需要各国共同商量着办, 建立国际机制、遵守国际规则、追求国际正义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29] 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涉及的相关问题都交由各参与方平等交流、协商, 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 集思广益, 民主决策。第二, “共建”就是各国共同参与、齐心协力。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需要各参与方发挥各自优势和特长, 共同投入资源、承担责任。10多年来, “一带一路”合作从亚欧大陆延伸到非洲和拉美, 其中“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是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主要成员, 已有海洋合作共建的基础和经验。^[30] 第三, “共享”就是共同分享建设成果, 实现共同繁荣和进步。海洋不是争取霸权的工具, 而应成为全球共享的财富。^[31]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倡在构建过程中寻求各方利益交汇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 对接各方发展需求, 实现各方共享发展机遇和成果。

三、海洋命运共同体国际传播的话语框架

核心话语确定之后, 需要选择合适的话语框架为其传播提供导向和规范。话语框架的作用是为核心话语提供价值观支撑, 也是为深入全面地理解核心话语提供某种更具正当性的视角, 使核心话语更容易获得受众的共鸣、共情和共识。框架的作用不在于向受众提供全新信息, 而在于改变受众原有的信息属性权重来影响公众认知。^[32] 这种框架是基于事实的, 同时也是切入情感的。基于海洋命运共同体本身的特性, 其国际传播可以将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公共产品、全球海洋治理作为话语框架, 对相关的核心话语加以全面深入的阐释, 以增强其可信性、感染力和影响力。

(一) 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框架

2013年, 针对“人类向何处去”的世界之问、历史之问、时代之问, 中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为各国人民走向携手同心共护家园、共享繁荣的美好未来贡献了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备丰富的内涵, 包括跨越时空、超越国度的价值观, 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交往观, 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观, 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观, 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文化观, 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观。国际社会普遍认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利己主义和保护主义, 打破了个别国家唯我独尊的霸权思维, 反映出中国对人类发展方向的独到见解, 对于推动各国团结合作、共创人类美好未来具有重要意义。^[33]

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海洋领域的延伸实践。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贯彻其倡导的价值观、交往观、安全观、发展观、文化观和生态观,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探寻世界各国共同应对海洋公共挑战的新路径,最终实现海洋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生态的协调发展,实现海洋的和平安宁、人类与海洋的和谐共生。因此,海洋命运共同体国际传播要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贯穿始终,深入论述中国以秩序规则为基础、开放包容为路径、公平公正为目标的全球治理理念,逐渐建立“世界多样、国家平等、文明互鉴、包容发展、互利普惠”的“共同体理论语境”^[34];同时,厘清海洋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出发介绍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意义、价值基础、目标愿景和建设原则,阐释其对全人类共同价值和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尊重,对国际通行原则和规范的信守,对整个人类和平、发展、福祉和文明的贡献。

(二) 全球公共产品话语框架

经济学将公共产品严格界定为具有受益的非排他性和消费的非竞争性的产品。^[35] 英吉·考尔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全球公共产品的概念,指的是收益延伸至所有国家、群体及世代的产品,^[36] 其基本特征包括: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37],受益空间跨越国界,受益对象是所有群体而不仅仅是某个特定群体,受益时间惠及后代。全球公共产品由于具有这些特性而在维护国际秩序、加强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进入 21 世纪以来,由于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原有的全球公共产品不少已经失能,而新的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中国近些年提出了一系列全球或地区性的公共产品,如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上合组织等,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热议。

海洋命运共同体也具有全球公共产品的基本特征,即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在各个方面都是开放的、普惠的。海洋合作没有门槛限制,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可作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一员而聚合起来,共同致力于海洋的治理和可持续发展。对参与方的发展模式和合作模式没有统一的硬性规定,提倡基于自身特点和需求的多元化,不排斥更无意替代现有国际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在已有基础上推动参与各方实现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合作建立在“共商共建共享”基本原则下,所有参与国享有平等权利,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最终实现互利共赢,促进共同发展。

全球公共产品的话语框架与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特性高度吻合,也有利于消除外界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国的各种误读和误解。因此,海洋命运共同体国际传播可以从全球公共产品的重要性和稀缺性去阐释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意义,彰显其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价值;从全球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去阐释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原则,彰显其开放、包容与民主;从全球公共产品的普惠性去阐释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愿景,彰显其公益性和可持续性。

(三) 全球海洋治理话语框架

海洋治理是全球治理的重要领域。当前形势下,加强和改善全球海洋治理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日益凸显。一方面是因为海洋资源日益枯竭、海洋污染日益严重、海上灾难日益频繁、海上犯罪日益猖獗、海洋纠纷日益增多;另一方面是因为现有海洋治理体系不健全、治理机制不完善、治理标准不统一、治理效能不理想,改善海洋治理刻不容缓。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提出了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和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彰显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时代担当,顺应了国际社会和各国人民的热切期盼。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符合国际社会对海洋治理的需求、符合全球治理的普遍规范,也符合海洋治理的特殊性现实。海洋命运共同体倡导主权平等,国家不分大小,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和全球海洋治理进程的参与者,海洋环境应由各国共

同保护, 海洋资源应由各国共同享用, 海洋事务应由各国共同管理。^[38]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西方主导的国际海洋理论的一次突破, 超越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独自享有的简单狭隘的海洋权益主张, 体现了对全球海洋治理乃至全球治理的深切关切, 具有宽广的国际视野和对整个人类前途命运的深厚情怀,^[39] 有利于提升全球海洋治理的能力和实效。

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传播应该客观反映全球海洋治理面临的问题、困难与挑战, 客观反映各国人民对改革海洋治理体系、创新海洋治理机制的呼声, 在此基础上全面介绍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倡导的海洋治理理念、原则、路径和措施, 深刻阐述其对海洋治理现有问题和海洋发展规律的深刻洞悉, 深入剖析其对海洋治理体系和机制的大胆创新, 充分展示其对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海洋新秩序、维护世界海洋和平、推动世界海洋发展、促进人类与海洋和谐共生所做的贡献。

四、结 语

确立核心话语和话语框架是话语建构的关键环节。从话语建构的角度而言, 海洋命运共同体国际传播的核心话语就是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意义、价值基础、目标愿景和建设原则, 这些方面基本涵盖了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主要内容, 反映了其主要特征。对于这些核心话语的阐释, 可依据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公共产品、全球海洋治理三种话语框架进行。这三种框架与海洋命运共同体有着本质上的关联性, 加之其已受到了广泛瞩目与普遍认同, 可显著提升核心话语的传播效果。

鉴于世界政治和国际舆论的复杂性, 也鉴于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创新性的全球海洋治理新方案, 在国际传播的话语建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到海洋命运共同体本身的特性, 还要考虑到不同国家及其民众的差异, 把握好话语策略。一是在话语实践过程中应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文明交流互鉴的核心理念, 以平等平和的心态沟通, 切忌居高临下、强加于人; 二是要突出共性, 强调共同价值、共同利益、共同责任、共商共建共享, 适当淡化中国色彩; 三是要采用融通中外的表达方式, 让国外受众听得清、听得懂、听得进; 四是要重视受众反馈, 及时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 澄清误解和谣言, 促使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赢得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广泛认同和支持。

参考文献:

- [1] 求是网. 人民海军成立 70 周年 习近平首提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EB/OL]. http://www.qstheory.cn/zdwz/2019-04/24/c_1124407372.htm.
- [2] 新华网. 习近平集体会见出席海军成立 70 周年多国海军活动外方代表团团长[EB/OL].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04/23/c_1124404136.htm.
- [3] 崔守军, 范存祺, 郑执浩. 跨文化交流视阈下东盟对中日情感话语比较研究[J]. 当代亚太, 2023(1): 70-99, 158-159.
- [4] 陈文泰. “此在”与“遍在”: 跨文化传播间性审思的两个向度[J]. 编辑之友, 2023(11): 99-106.
- [5] [英] 诺曼·费尔克拉夫. 话语与社会变迁[M]. 殷晓蓉,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3: 1.
- [6]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M]. 高名凯,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161-163.
- [7] 吕鸣. 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话语权建构[J]. 国际观察, 2023(2): 102-131.
- [8] [法] 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 监狱的诞生[M]. 刘北成, 杨远婴,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9: 113.
- [9] Grant, R. W. & Keohane, R. O. (2005). Accountability and abuses of power in world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99(1): 29-43.
- [10] 阮建平. 话语权与国际秩序的建构[J]. 现代国际关系, 2003(5): 31-37, 59.
- [11] 汤景泰, 史金铭. 核心话语与话语框架: 论美国涉华舆论的话语建构[J]. 政治学研究, 2022(2): 66-77, 169.
- [12] 张艳艳.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话语体系建构研究[D]. 兰州大学, 2022.

- [13] 史安斌, 杨晨晞. 国际传播的变局与“元软实力”的兴起: 内容·渠道·受众 [J]. 对外传播, 2022 (11): 4-8.
- [14] 刘涛. 新概念 新范畴 新表述: 对外话语体系创新的修辞学观念与路径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7 (2): 6-19, 126.
- [15] 王丽红. 论话语权的多元属性及作用机理 [J]. 江汉论坛, 2014 (12): 55-59.
- [16] van Dijk, T. A. (1997). *Discourse as structure and proces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17] Fairclough, N. (2009). Language and globalization. *Semiotica*, 173 (1/4): 317-342.
- [18] Goffman, E. (1974).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M. A. Thesi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 Pan, Z. & Kosicki, G. M. (1993). Framing analysis: An approach to news discours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0 (1): 55-75.
- [20] 唐青叶, 张稳. 话语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国际传播 [J]. 对外传播, 2023 (11): 48-52.
- [21] 周芳.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丰富内涵与价值旨归 [J]. 人民论坛, 2023 (23): 55-57.
- [22] 新华网. 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 (全文) [EB/OL].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9/29/c_1116703645.htm.
- [23]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四卷).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 475.
- [24] 宋伟. 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与新的海洋文明 [J]. 人民论坛, 2023 (20): 30-35.
- [25] 和音. 推动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 [N]. 人民日报, 2022-10-22 (3).
- [26] 郑敬斌, 陈艺璇.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历史和实践逻辑 [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5 (1): 25-33.
- [27] 李慎明. 正确认识和深刻理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内涵 [J]. 红旗文稿, 2019 (17): 34-36, 1.
- [28] 刘巍. 海洋命运共同体: 新时代全球海洋治理的中国方案 [J].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2021 (4): 32-45, 2-3.
- [29] 人民网. 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 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 [EB/OL].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1014/c1024-27694359.html>.
- [30] 谷漩, 王妍卓. 专家访谈: 全球海洋生态治理现状及趋势 [J]. 人民论坛, 2023 (20): 20-25.
- [31] 刘训华, 励琳. 海洋教育史: 概念、体系与战略视野 [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23, 25 (6): 22-28.
- [32] Nelson, T. E., Oxley, Z. M. & Clawson, R. A. (1997). Toward a psychology of framing effects. *Political Behavior*, 19: 221-246.
- [33] 新华网. 既是倡导者也是行动派——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行动受到国际社会广泛支持与认同 [EB/OL]. http://www.news.cn/world/2023-09/26/c_1129887716.htm.
- [34] 湛力, 吴薇.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研究 [J]. 思想理论战线, 2022, 1 (3): 71-76.
- [35] 杨娜. 全球公共产品的属性探讨——兼论中国推动新冠疫苗成为全球公共产品的挑战及路径 [J]. 国际政治研究, 2022, 43 (4): 9-30, 5.
- [36] Kaul, I., Grunberg, I. & Stern, M. (1999). *Global public good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37] 刘曙辉. 国外学界关于西方疫苗民族主义的批判性研究评析 [J]. 世界民族, 2023 (2): 36-47.
- [38] 宗海平. 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N]. 人民日报, 2023-2-15 (3).
- [39] 刘巍. 海洋命运共同体: 新时代全球海洋治理的中国方案 [J].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2021 (4): 32-45, 2-3.

[责任编辑: 华晓红]